

我們追上瑞士？（下篇）

王世榕

瑞士人除了「準時與精準」外，到底呈現出哪些特別不同的民族性格，我們延續上篇，繼續深談。

透明與責任

瑞士做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大至聯邦政府，小至阿爾卑斯山谷裡十幾戶人家的小聚落，一切依系統而運行。這個系統可以稱之為法律，也可以稱為規則、習俗、章程、手冊等等。凡百施政，申請一份文件，一切規定清清楚楚，上網一查就得了；不然，打個電話給當地機關或公司行號，或以電子郵件相詢便一切搞定。就像瑞士手錶，自在運行，分秒不差。你只要定期維修上油即可，除非發生不可抗力的災變；一旦發生，臨時性的應變方法一定緊接著設立，將系統的運作維持下去。因為災變發生的可能性和應變方法也早列入系統中了。一切well prepared和no surprise。

上了油的民主制度

瑞士的民主聯邦制度也如同上述一樣，同鐘錶般日日運作下去。有人將瑞士的民主制度稱為上了油的機器式民主制度（well-oiled machine）。上下院何時召開院會、委員會；地方村政府何時開會、何時舉行公投，一切都早在一年前或開會

前三個月清清楚楚地以各種方法告訴你。一切透明，也都可以上網查詢。

為了要使人民知道最高權力機關一即上下院一到底在討論什麼議題，瑞士的官方甚至民營電視台幾乎每晚在黃金時段內舉行各政黨的圓桌辯論節目。基本上由電視台的資深記者擔任主持人（moderator），邀請瑞士的四大政黨各派一名代表上台申論該黨對該議題的看法和主張；離主桌兩公尺，通常也設有各政黨對議題討論所派出的支援人士，提供資訊給台上的隊友（原則上由該黨的大老或黨鞭擔任，但這也不是一成不變，有時由對該議題訴有研究的議員參加，有時則派遣新銳參加以茲培養），其次在離第二圈支援桌的後方，通常是圓形階梯型的會議廳，則由對此議題感興趣或也想發言的人自由參加。

請注意，第一圈和第二圈基本上是此次公開討論會的主角和配角，他們是站立著的，只有第三圈的聽眾席才有座位。據友人告知，這種讓第一圈和第二圈的人沒有座位的作法，是有其深層原因的。因為討論公共議案，本來就是上下院議員的職責，在議會裡辯論，受限於法案的時間性和議事規則的限制，不太可能辯論得痛快淋漓，須把場景搬上電視台，才能辦到。再說，向人民報告本來就是議員的責任。所以上台討論或辯論的大小牌議員不需座位。

不過我個人認為，除了上述「職責」的原因外，還有另一層文化因素，那就是瑞士人特別喜

愛舉辦各種站著的宴會、酒會、派對等（Stand-up Party）。瑞士人比鄰近國家人士相比較為靦腆，既不像法國人一樣喜歡擺龍門陣，也不像義大利人那樣熱情，陌生人一下子也會變成哥倆好；瑞士人也不像北方的德國人，瑞士到底是小國寡民，採取老二哲學，在人群中不喜歡出風頭，最主張人人平等。因此與德國人相比，瑞士人顯得溫文、安靜也禮貌多了。

以上的電視節目，約長一或一個半小時。除了第一圈台上的主角可以侃侃而談外（最好盡量表現出紳士風度），第三圈的人士，通常也有機會發言，或抒發自己心得，或請教第一圈主角。總之，這種議題透明化的電視討論節目，對淨化和提高議會生態功勞不小。台灣如果有此電視節目，保證立法院的言語和動作暴力行為將減少許多。

就是因為透明化，任何公共議題在電視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公開討論，一些媒體的評論節目自然不敢以獨家姿態亂放炮或造謠，一如今日的台灣媒體；再者，台灣電視上名嘴擔綱的電視節目自然也就銷聲匿跡，歐洲有由專家以批判政策為主的、深入報導式的電視節目，不過不如由議員當事人直接上場來得直接又實在。

以上瑞士的各政黨政策討論節目，在歐洲各國都相當盛行。瑞士的大小公私營電視台（包括國外的在內），均以此類議員上陣的政見討論節目為主軸。尤其對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瑞士人口七百五十萬，其中一百五十萬為外國國籍之人士），這是一個直接了解瑞士國內外大事和檢驗民主成熟度的最好機會。而台灣的名嘴政論節目（討論的內容十之八九與議題無關，換言之，不是共同以不同角度來詮釋政策，從而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法）使聽眾模糊問題焦點，將問題八卦化，使人民民主素養向下沉淪。

民主的真諦之一，即在意見之自由交換（market place of idea），但意見之提供，必須有關公益，與公眾有關，從而不僅提供不同觀點，同時也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法。譬如在瑞士，長久處在透明、真正政策討論的媒體的影響下，民主的素養和風度自然不斷提昇。反觀我國，在目前這種八卦媒體的浸淫下，日久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日漸低落，人民對待不同聲音和意見相異之人物的寬容性，也必將日益沉淪。這真是一場荒謬的大悲劇。

由於一切透明，規章又訂得極為詳實，因此在公私組織上的人事安排，也是精打細算，絕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甚至一個人身兼數個工作，務必權責分明。什麼人負責什麼業務，人民皆可以上網查詢（負責國家安全和偵辦犯罪機構之人名當然除外，不得列於網站上）。

誠實為重的孩童教育

瑞士人的孩童教育中，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教導孩童誠實，不得說謊；可以不對陌生人開口長篇大論，但不得說謊，不得拒絕回答；自己的事要自己負責。瑞士的小嬰兒一般說來，若是跌倒了，父母的反應不是馬上衝過去替他解決困難或是排除危機，然後摟在懷中安慰。這是法國式、東方式以及台灣式的做法。瑞士的父母是教孩子自己爬起來；若有其他小孩欺負，教他直接反擊，不必客氣。這種要小孩了解只有靠自己，負起自己的責任的嬰兒養育法（child rearing），就活生生道出瑞士民族性的另一面，此即一切靠自己，對他人有禮但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自己闖的禍自己負責收拾，不要期望五百年才出來一次的聖人或英雄來解救；再延伸得遠一些，老百姓只有靠自己才能把日子過得好一點，聯邦政府也

好、議會也好，各有職司，但有關與外國締約或是否加入歐盟、UN（經過十餘年數次公投的失敗，2003年的公投終於通過）和其他憲法上規定的大小議題，皆需透過公投定奪。人民的事，終究要人民自己負責解決，不能全靠政府和議會。這種人民透過公投（創制與複決）處理一般重大事件的民主政治體制，叫做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希望以後有機會向本刊讀者好好介紹此制度。

從容有序的處事性格

由於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權責劃分得清清楚楚，國家大事、個人的日常小事一切「依章行事」，不慌不忙。瑞士人的公私約會通常最好在兩三個月前就敲定；一經敲定便不會更改。剛到瑞士時還被這一套「約會」習慣弄得極不習慣，原因是國人好即興演出。通常一個星期前的通知或約定，已經算非常難得了。當然，既然約定和執行相差達兩個月，因此有關議題和討論的大綱和內容，雙方最好準備一下，屆時才能談得較具體和具建設性。

我們駐外館處一向喜歡國內團體來訪，但請早日通知，譬如半年前通知，如此一來，駐外館處才可以國內訪團來訪為理由，與相關單位聯繫，相互認識。訪團一來，訪問成功最好，馬馬虎虎也可以。因為至少給了駐外館處一個機會，而在訪團回國後，尚可藉此與該受訪單位繼續保持聯繫，甚至「順藤摸瓜」，由該受訪單位再擴展出去，多認識幾個單位，多結交幾個友人。

瑞士的各政府機構，若沒有一定的理由，能夠登門拜訪嗎？我想，在歐洲各地都一樣，台灣政府人士（駐外館處人員）一出門拜訪，受訪單位就一律將此一訊息提交到外交部亞太司（主管我國和中國幾個地區之外交業務），再由該司之

官員依分層負責由某負責人站在瑞士國家立場，也就是說在遵守一中政策下（此乃瑞士對中國和對台灣之主導外交政策）做出可否的決定。

換言之，我們每一行動，都受到嚴厲的「監督」和嚴密制度式系統的管控。可憐的是駐外館處此一小小的願望，也就是願國內訪團多多訪問瑞士，或是早日於訪期三個月至半年前通知駐外館處，一直得不到國內訪團的了解。主要的原因，依我看來，還是在民族性的不同。

台灣人不時與半年前就與受訪單位敲定時刻和主題。台灣人出國訪問，主要是消化預算；主要是旅遊，美其名曰增廣見聞。國人基因中就是缺少向他人誠懇請教、好好學習的因素。

大概是以上民族性作祟，我們代表處接到國內訪團的預備或聯繫時間，通常在十天左右，較可惱的是來函常常缺東缺西（通常由外交部轉發，而外交部各主管司也通常只是形式的轉發而不做實質或內容的核發）。結果可想而知，受訪單位與聯繫單位常因時間和內容因素導致合作不大愉快，而訪問單位和聯繫單位—即駐外館處也因時間因素和資料不齊全而弄得雙方合作不太順利。至於訪問單位和受訪單位的互動情況，也時常不是相當圓滿。這種訪問大概一次就斷了線。斷線不打緊，台灣的「大名」也跟著在該單位傳開，我們等於又丟臉一次，又打了一個敗仗。還好，天佑台灣，比台灣「混」的國家也很多，因此，台灣的大名還不至於遠播到被人嫌惡的程度，駐外館處扮演我國駐外派出所或babysitter乃眾人皆知的事。

刺蝟原則

瑞士人負責的態度，依上述，絕對與孩童教育有關。另外依個人看來，似乎也與瑞士歷史有

關。從一八〇三年在法國拿破崙一世的強制下，制定了The Mediation Act，成為Helvetia聯邦後，所謂今日瑞士的人民和領土才大致確定下來。之前，瑞士聯邦的形成，根本是歷史上各邦逐漸由瑞士自由邦而形成的（即不屬於神聖羅馬帝國或法蘭西王國管轄，也不與日耳曼的大小諸侯國或義大利米蘭、教皇領地，甚至那不勒斯公國發生隸屬關係，而由邦內人民自治而言），所以邦內的大小事自治，自己負責，與瑞士聯邦（主要由伯恩和蘇黎世兩大自由邦主導）訂有攻守同盟的關係而已。

因此，邦內人民不得自行處理邦內事務，對邦內事務，採取絕對負責的態度，無法推諉給「中央政府」或他邦政府。從中世紀以來，要維持自由邦的地位，唯有自保，維持全民武裝，把自己打扮成刺蝟，對來犯的敵人予以痛擊。這就是有名的「刺蝟原則」（procupine priciple）。

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希特勒挾其絕對優勢兵力，最後終於打消以三個月征服瑞士、打通聖格達隧道以便德義直接領土接壤的念頭。瑞士所憑障的就是自己的力量，負責自己生存的刺蝟戰略，也就是數百年來瑞士人這種負責性格的形成，深深影響到瑞士人進一步全民自治的主張和實踐。因為要確保一個平等和民主政治社會，是不能單靠政府的善意和人民代表（議會）的監督政府而完成的。

熱心公益的無私行為

這種性格發展下去的結果就是社會上產上的一種稱為維護公益而好管閒事的人士，他們通常是熱心公益愛護國家的人們。他們因為看不慣沒有公德心的人破壞社會的秩序、良俗或禮儀，例如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或穿著邋遢。若有人不小

心觸犯，這些熱心人士便會以好言相勸的方式出面警告或制止。而社會上其他人士亦對此報以掌聲以示支持。

瑞士人的這種干涉，不是意識形態作祟，也不是領薪替政府做事，而只是自動自發單純地糾正一些文明社會中不應有的舉止而已。因此，瑞士人頗為自豪他們這種無私的行為（稱之為civil courage或waden beisser）。當然七〇年後，個人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盛行（有人歸咎於六八年法國五月運動），這種現象已相對減少。個人在瑞士六年期間，在鄉間見識幾回罷了。大多數人對破壞文明禮儀的任性行為頂多搖搖頭，慨嘆人心不古而已。看來，舊有的傳統瑞士社會，已開始有了鬆動的徵兆。

企業需負起社會責任

瑞士人的責任觀不僅要求個人和政府要切實地將責任列為打從心裡就必須服膺的做人做事原則，瑞士人也同樣要求企業對社會負起責任。2007年，瑞士的公眾之眼（Public eye）所頒發的「不負責任企業獎」，就由瑞士國內的諾華地製藥公司（Novatis）獲得，而國際企業則由日本著名的普力斯頓輪胎公司（Bridgestone）拿下。瑞士第二大零售集團Coop則是榮獲公眾之眼的「企業肯定獎」的第一家公司。

諾華地製藥公司之所以「獲獎」，是由於該公司企圖進行專利侵權起訴，去限制印度和發展中國家不得廉價取得該藥廠生產之藥品。印度癌症援助組織提名諾華地製藥公司理當得此臭名的理由，是該藥廠壟斷生產和高價銷售，對全球癌症患者所造成的痛苦，有違社會的期望。

至於普力斯頓公司則因為在利比亞的橡膠園實行了八十年的類似奴隸制度，使得童工和生態

災難在那裡如同家常便飯，此獎項是由美國NGO Green Advocates推上頒獎舞台。

上述獎項乃由瑞士的兩個NGO、伯恩宣言（Erklärung von Bern）和善待自然（Pro Natura）在考察了瑞士國內外四十個企業後才頒佈。此一例子說明了瑞士社會對正派經營和負起社會責任的全球企業之監督。

尤有甚者，企業若不好好經營，有負股東和社會信託，則訴之以法。從2007年起，瑞士檢察署正式開庭，起訴鼎鼎大名但因經營不善而遭德國Luftensa航空公司的瑞士航空Suisseair的幾位首腦人物。截至2008年個人返台為止，此一訴訟仍在進行中，電視上只見到被訴的瑞士航空人物對記者娓娓道出該公司之垮台，自有不得已之因素云云。希望藉由司法理出責任，絕不偷逃及規避責任。反觀幾年來我國一些赫赫有名的企業主，大喊政治迫害卻又潛遁國外，大搖大擺的模樣，人品之落差，兩國社會控制和制度差異之大，不言而喻。

禮貌與信任

毫無例外，瑞士也像其他國家一樣，孩童從小就被教導誠實、有禮貌，我國亦然。不過，我們卻接著教育或暗示我們的孩童要明哲保身，絕對不要挑戰權威，也不要對人一味地說實話，要看對方是誰而定。

換言之，我們從小在「差別格局」中以親疏關係決定舉止，由內而外，由近而遠。也就是說我們的誠實和禮貌會因人而異有所不同。長久下來，我們的孩童就容易產生取巧心態和勢力眼，人與人之間起碼的禮貌便蕩然無存了。尤其是陌生人之間，初步的對話和舉止，往往令人惱怒和不快，再加上幾千年來的帝制和專制，政府與人

民雙方處於對立面上，一方是貪官污吏，另一方當然是刁民。於是乎我們的法令規章以防備為主，處處站在摘奸發伏的立場，對法令做最完美和嚴苛的規定。

初到瑞士的人，往往為其鐵路和公車竟然不設門閘而「惶恐不已」。其次，也往往因為瑞士人口口聲聲地Danke和Bitte不絕於口而感嘆不已。整個社會可說呈現一片祥和與彬彬有禮。同樣地，瑞士政府針對來信必定有問必答，絕不會失去禮數。

個人在瑞士工作期間，前後任的兩位亞太司司長在外交政策上堅持「一中原則」，對我們往往造成不利和不便，但在來往，針對我的去信和問題，皆有回覆。我個人不認為這只是外交禮節的表現，瑞士人的待人處事，早已融入禮儀此一重要因素。原因除了教育，瑞士的歷史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試想在一個多元語言和文化的社會，如果彼此不容忍又沒有禮貌，那不爆發社會不安才怪。

我舉一個天天發生的「怪事」來與大家分享。

他們之多禮和行禮如誼，已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一般說來，瑞士人在餐桌上一定先舉杯互道健康。舉杯也有一定規矩，必須單手舉杯至眉頭高處，眼睛與對方眼睛平視，互相輕敲一下，再互道健康而後啜一口。若先行離席，必需的禮節是一一與同桌及別桌的每個賓客道別，有握手禮，有親頰禮（在瑞士和比利時是左右左三下，法國是左右兩下），也有拍肩、擊掌等，視雙方交情而定。但一一道別，禮不可省。

我個人參加「伯恩八十」的民間大使協會（Ambassador Club International），這是個如同扶輪社般的國際民間團體，每月碰面一次或餐聚、或旅遊和參訪。社員之間當然相當熟絡（今年該會出了一位世界總社長Martin Schwab大律師，也是我相

識二十年的老社友），但是一上餐桌，上述的禮儀一定得履行，馬虎不得。這說明了瑞士人之重視禮貌和禮儀，並重視傳統以及藉儀式重申彼此的關係和友誼。這已經有點像祕密社會裡的一套固定儀式了，瑞士人之重視友誼、團結、傳統這些不輕易改變的儀式恐怕也扮演了相當的份量。

教育外塑的法紀價值觀

與德國人比較，瑞士人的遵守法規與尊重傳統打從孩童教育方式，就已經不同。德國婦女針對孩童調皮或哭鬧不休，通常的制止方法是告知「媽媽不喜歡這樣」。於是德國孩童將社會Norm逐漸內化為自己的驅動力量。有所異議，則可以直接與外在權威的化身即母親討價還價。在此意義下，德國人要嘛打從心底服從社會規範，要嘛就是挑戰權威，來個革命或創新，所以德國比瑞士較容易產生思想家、藝術家等思想方面的大師，其來有自。

相反地，瑞士的母親養育孩童比較喜歡以外在而非母親扮演權威化身之方式去教導。譬如她會以「旁人會不喜歡、警察會來制止，或食人魔會不客氣地吃掉你」等方式制止孩童的調皮行為。因此瑞士人的守法遵紀，乃是外塑的而非將社會規範內化為孩童本身的價值觀。瑞士人比德國人更注重技藝，瑞士人在歷史上產生六位科學方面的諾貝爾得主，迄今未產生出一位文學或和平方面的得主，恐怕與孩童教育有密切的關係。

具憂患意識的瑞士人

大概是這種外塑型的價值觀體系所產生的瑞士人性格，加上歷史上一直震盪不安、民族宗教衝突又和平的共存環境，瑞士人除了守法，對於

外在環境和變化，永遠抱持著一份警戒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態。每天努力工作，但瑞士人知道，失業或大災禍還是會來臨，於是拼命賺錢就是生活不二法門。瑞士人保險業、銀行業興盛除了瑞士人的誠實、精準外，憂患意識恐怕也是一個主要因素。

有人說，就是因為這樣的性格，瑞士人有著其他民族少有的「鬱鬱寡歡」（muff）性格，瑞士人少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邁，也少有趨向於極端的個性，永遠採取中庸實在（pragmatique）的處事態度。

他們有著二十餘種說法形容工作以及各類工作的性質；但從工作所產生的歡樂，就如同上述，只有一個字fröie。

因此瑞士人是屬於好天氣時還要防備壞天氣即將來臨的那種想法的子民。無怪乎瑞士人的自殺率之高，在歐陸大大有名，曾經拿下第一名，目前落至第三名的位置，緊排在北歐的挪威和瑞典之後。瑞士（特別是德裔的瑞士人）好像不是一個快樂的民族。

從兵制看瑞士人的守法性格

瑞士人的守法，個人舉一個實例就可見一斑。

瑞士與台灣一樣，施行全國徵兵制，一旦國家有事，在兩三週內動員兩百萬士兵乃折枝之易。瑞士的新兵訓練約一千日，之後解散歸返社會，再由各種定期和短期訓練至四十五歲除役。

此一制度和台灣的兵役制度大致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即在於新兵訓練後，各個士兵帶著所有軍事裝備，荷槍實彈帶回家。爾後召集時，再全副武裝上基地。因此平時或假日，在瑞士經常可以看到一兩節火車車廂滿載士兵。不知底細的，還以為瑞士發生了軍事叛變哩！

我問過幾位國會議員你們難道不怕這些受訓後返鄉的年輕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之餘，各自返家取出軍火大幹一場？我得到的答案千篇一律：「這絕對不可能，拿槍傷人是犯法的。」

老實說，我真服了瑞士人，不，應該說是那些役齡年輕人，他們不會因爭吵而以軍事武器互

相傷害，若在台灣，我想大概早就槍聲不絕，甚至砲聲隆隆了。光憑這一點，台灣百年內也趕不上瑞士！

（本文作者為我國前駐瑞士代表）

出版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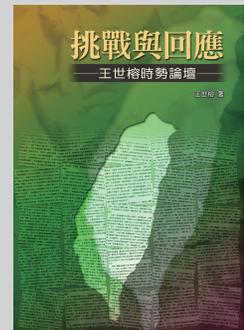
《挑戰與回應－王世榕時勢論壇》

作者：王世榕，前英文新聞日報總主筆兼總編輯、前駐瑞士代表。

出版日期：2008年6月1日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針對定居、旅居於瑞士之我國僑民和其他華人，愷切提出他個人看法來因應紛至沓來的大小問題，諸如文化震盪、身分認同（文化上、政治上和種族上）、社區參與和中華帝國思想……等。本書為作者擔任近六年（2002~2008）之駐瑞代表時，所發表於《瑞士僑訊》之精采文章集結而成。



《舵手與菁英》

作者：陳三井先生，法國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出版日期：2008年7月1日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台灣省彰化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組主任、副所長、所長，曾借調擔任淡江大學教授兼歷史學系主任、國立空中大學教授兼人文學系主任。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研究政治人物之論文結集，共分孫中山研究、蔣介石研究、革命人物、知識份子、華僑革命五輯，對象除孫中山、蔣介石外，包含陳英士、居正、王京岐、周恩來、陳炯明、吳稚暉，並旁及知識份子與華僑，探討他們的思想與活動，論述個別事件的影響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引證詳實，分析精當，文字洗鍊可讀，允為洞觀近現代中國史不可不讀之佳作。